

发现历史的隐藏款

▶ 侯旭东

编者按

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解放的力量，我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侯旭东的演讲《发现历史的隐藏款》，带我们一起寻找被“大历史”遮蔽的日常经验与多种可能性。



侯旭东演讲

什么是历史的隐藏款？哪些会被隐藏？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这些历史的隐藏款？先从几个历史小故事讲起。

汉景帝竟吃老鼠？从阳陵动物骨骼探饮食秘辛

第一个故事，我们来讲汉代的一位皇帝。他父亲有名，儿子更有名，正是汉景帝。汉景帝常与父亲文帝并称“文景之治”，开创汉初局面，也为儿子武帝开疆拓土奠定基础，这是大家熟知的。景帝本人



侯旭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出土文书简牍，近年关注古代国家的形态与运行机制。出版《汉家的日常》《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宠：信一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与《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译著数部、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贡献卓著，除了文景之治，还平定过吴楚七国之乱。当时七个诸侯国举兵造反，危及西汉存亡，景帝果断平叛，让汉朝渡过危机。不过今天要讲的，不是他的这些丰功伟绩，而是景帝和老鼠的故事。

大家看到“老鼠”或许会奇怪：这是人人喊打的动物，过去还是“四害”之一，怎会有景帝与它的故事？答案就隐藏在景帝的阳陵里。

现在的阳陵，如今中间是高高的封土，四周是田野，但2000年前并非如此，那时四周有许多建筑，地下也不只是黄土，埋着大量随葬品。考古学家经几十年探测研究发现，景帝封土周边共有80多条外藏坑，从平面图可见每面约20多条。其中东侧外藏坑部分做过发掘，出土文物多收藏在阳陵附近的阳陵博物馆。13号、14号和16号外藏坑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经过鉴定，发现包括常见的牛、羊、兔、犬，还有猫、狐狸、豹子、四不像、鹿等，还有软体动物，从编号上看，大多出土于16号外藏坑，

※ 本文为侯旭东教授2025年11月18日在人文清华讲坛《发现历史的隐藏款》演讲的文字实录，刘师昭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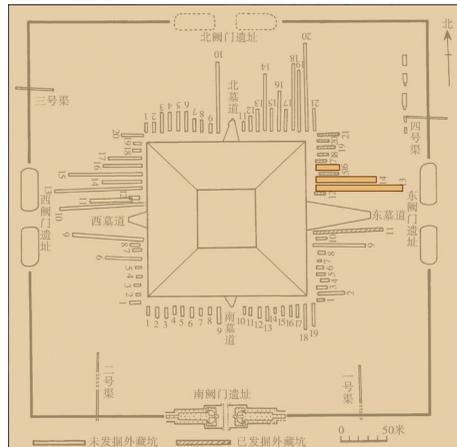


其中特别的是两块老鼠骨头，鉴定认为是褐家鼠。

外藏坑为何会埋藏这么多动物骨骼？汉代人与今人不同，他们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仍需吃喝、穿衣、出行，所以会在墓葬中埋入生前用品，这些动物骨骼便是作为食材放入的。而且他们不仅认为地下如此，在地上宗庙中，也会给已故祖先供应食物。汉代人可能一天只吃2顿饭，那给祖先宗庙供应几顿呢？文献记载供应4顿饭，比生前还多，正因他们认为逝者和生前一样需要吃喝。

这些骨头既是随葬食物，那其中的2块褐家鼠骨头，难道也是当时的食物吗？今人不吃老鼠，2000年前的汉景帝会吃吗？应该也不会。那老鼠怎么到了外藏坑中呢？老鼠天生会打洞，很可能是外藏坑埋葬后，老鼠钻洞进去不幸死亡，2000年后被考古学家挖出，成为研究对象。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吧？考古学家最初也这么认为，所以动物考古学家鉴定阳陵外藏坑动物骨骼后提出，除后期侵入的褐家鼠，其他骨骼都是作为皇帝膳食放入的。

这个结论看似合理，但它是否正确？几年前



▲ 阳陵
▶ 阳陵外藏坑

偶然看到这样的结论，我就产生了疑问，因为我曾见过另一批墓葬出土的材料，来自汉景帝之子，也就是河北满城县的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的墓。满城在今保定市西侧，1968年解放军在此施工发现山中的墓葬，随后进行了发掘。这两座墓规模很大，均在山中开凿，刘胜墓为1号墓，位于南侧；其妻窦绾墓为2号墓，位于北侧。墓中出土了河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就是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除了这些器物，墓中还有不少发现：长长的耳室



阳陵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

里放了很多罐子,1号墓(刘胜墓)的北耳室和2号墓(窦绾墓)的南耳室都有大量陶罐,里面装着酒和各类动物骨骼。其中三个陶容器里有许多小骨头,考古学家鉴定后发现,1号墓的一个陶瓮(编号1:3502)和2号墓的陶壶(编号2:2024)和陶罐(编号2:2205)中,有岩松鼠、社鼠、褐家鼠等多种老鼠骨骼,还有黄鼬(黄鼠狼)。这些老鼠可不是一两只,而是几十甚至上百只,且

有的容器(如陶壶)有盖。这些会是后期侵入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考古学家明确指出,陶罐、陶壶中的老鼠是当时作为食材放入耳室的,而耳室的功能相当于地下厨房,因此推断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生前吃老鼠,故下葬时将其作为食材随葬。而且这种习俗并非仅他们有,近年河南新乡发现的汉墓中,也出土了老鼠骨骼。

看一下新乡汉墓的分布图,左侧是墓区的位置,右侧是墓区分布。其中红色方框标出的5号汉墓出土了不少老鼠骨骼,考古学家鉴定为中华鼯鼠和东北鼯鼠,这两种鼯鼠习性独居,不会聚集,但墓中却有不少。考古学家结合中山靖王墓和南越王墓的情况推断,这些老鼠可能是墓主人身前的食物,故死后作为食材随葬。

中山靖王是汉景帝之子,他吃老鼠,是否意味着景帝也吃?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父子习俗或有不同,或许景帝并不吃。那能否进一步证明阳陵的老鼠不是后期侵入的?我们可去看看景帝阳陵外藏坑的构造。考古学家提供的剖面图显示,下方两层为木结构外藏坑,上方有两层棚木,盖好后铺放垫土。垫土厚2.88米至3.38米,是汉代修建完外藏坑后铺设的,可分若干层;棚木厚14厘米至32厘米,共两层。老鼠要钻到外藏坑中,需穿过约3米厚的



新乡汉墓位置(左图)及墓区分布图(右图)

垫土层,还要咬穿十几厘米厚的两层棚木,这可能吗?看看褐家鼠的打洞深度,动物学家研究显示,褐家鼠打洞一般深1米至1.5米,最深不过2米。显然,它不可能钻过3米地层、咬穿十几厘米木头进入,这种几率极低。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2块褐家鼠骨头代表的个体,不是后期钻入的,而是下葬时作为食材,与其他动物一同放入景帝阳陵外藏坑,原因就是景帝生前也吃老鼠。

这便是第一个故事的基本结论。知道汉景帝、其子媳及其他汉代人吃老鼠,只是了解了汉代人的一种特殊饮食口味,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隐藏款。仅此而已吗?不,这背后还有更深的隐藏款,关乎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大家之所以赞同老鼠是钻进去的,是因为今人不吃老鼠,所以有了这样的假设,考古学家最初也受此影响,但分析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为何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有限,习惯用自身经验推断2000年前的古人,认为古人与我们一样,这种思维习惯就是“以今度古”。

通过汉景帝吃老鼠的故事,我们需反思“以今度古”的习惯:唯有放弃成见才能有所发现,意识到无知才能获得新知。这就是第一个小故事的意义,

它告诉我们，发现历史隐藏款的关键，是放下成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道光帝的日常，不止有“鸦片战争”

除了这些，我们要发现历史的隐藏款，还会遇到“定见”这个障碍。

下面来讲第二个故事。我们坐上时光机，从汉代跨越两千年来到19世纪中叶，看看另外一位皇帝，他就是道光帝。道光帝1782年出生，1821年即位，1850年退位，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鸦片战争。

1839年虎门销烟后，英国人不满，决意发动战争，派兵远渡重洋来到广州附近海上。英军从广州北上，经厦门、浙江抵达天津，之后又返回。1840年到1842年期间，鸦片战争堪称当时最大的事。这场战争让中国从古代进入近代，也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这段历史多来自历史教科书，而历史学家形成这些认识，主要依靠有关鸦片战争的基本史料。

学界最常接触的基础史料是一套七册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这是现代学者围绕鸦片战争，从可见的文书、档案、国内外资料中收集整理而成的，研究鸦片战争时期历史，最基本的资料来自这套书。除了这本，还有咸丰皇帝时期编修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年间，皇帝意识到与英国人打交道会成为常态，便将父亲道光帝时期与洋人往来的奏折、



虎门销烟国画（李永文）

谕旨汇集起来编成此书。不过这本书当时并未公开出版，是秘密编修的，仅抄录一份供皇帝参考。直到1930年代，这部书才被发掘并公开印刷，我们今天才能读到。虽然编成于咸丰年间，但它距离鸦片战争结束已有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并非最接近历史现场的材料。

实际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更贴近历史现场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清代道光帝《起居注册》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起居注册》是当时的官员每天记录皇帝的生活与工作情况，按月编辑成册，最终汇集成《起居注册》。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是军机处每天收到的地方督抚大臣、北京六部及内阁等机构给皇帝的奏折目录登记，还包括皇帝各种批示的记录。它相当于今天办公厅机要室的文件收发记录，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两套常用的鸦片战争史料



《起居注册》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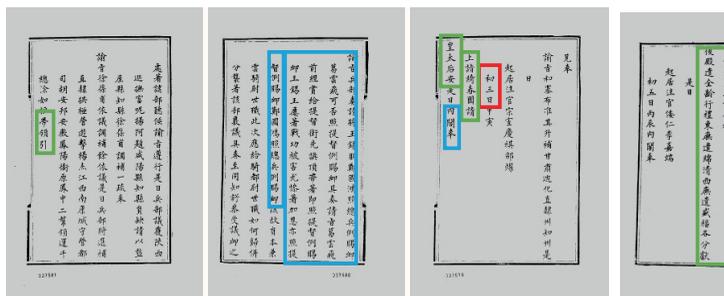
依据这两种资料，我们能看到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三年里的工作与生活情况。不过这三年时间较长，我仅选取两天作为例子展示。先看看《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我选的是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和初四日。红色标注

的是时间，后面是每天收到的文书，主要是上奏折大臣的姓名、奏折内容摘要和皇帝谕旨的记录，用蓝框标注的是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内容。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当时英军再次进攻浙江舟山群岛，定海被攻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战死。之后英军继续进攻镇海，镇海就在今天的宁波。当时在镇海督战的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他因战败觉得无颜见皇帝，最终投水自杀。九月初四这天，道光帝得知镇海失守，但还不知道裕谦已投水自杀，仍在追查裕谦的下落。

直到九月初八，道光才得知裕谦自杀的消息。裕谦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殉国级别最高的将领，这两天从这个角度看，堪称鸦片战争中很重要的日子。道光帝当时处理的文书里，只有蓝框标注的内容与鸦片战争相关，其他内容都无关。这些无关内容有很多，涉及官员考核、人员调动、经费收支、粮价、秋粮收成情况、人参票的发放、小案件处理等。皇帝在这些文书上的批示也很有意思，有的只写“览”，有的写“知道了”，有的写“著户部知道”，即将事务安排给户部处理，“刑部议奏”，即由刑部商议出个方案再上奏皇帝。

总之，这些事务与战事消息一同送到他的办公桌前，等待他处理。这就是《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里的内容，说明鸦片战争战事紧张时，道光帝面临的不只是战事，还有很多日常事务需要处理。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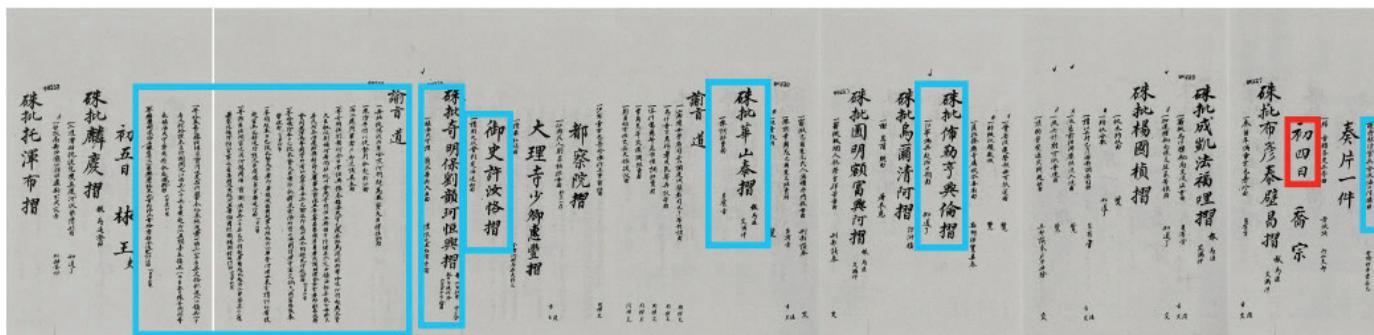


道光帝《起居注册》内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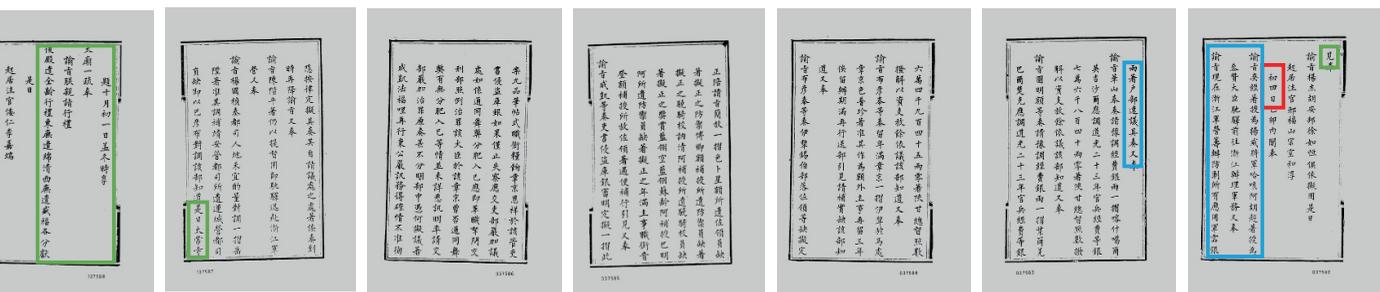
处理文书，他每天还会做什么？这些就要从《起居注册》中查看。下面我们看看这两天道光帝《起居注册》的内容，红色框标注的仍是时间，蓝框标注的是与鸦片战争战事相关的内容，绿色框标注的则是与战事完全无关的内容。

绿色框里的第一件事，是他去绮春园给皇太后请安。绮春园就在清华隔壁，圆明园最东边的区域。当时道光帝住在圆明园的九洲清晏，离绮春园很近。道光帝是有名的孝子，每两三天就要去给继母请安。除了请安，他每两三天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引见中级官员。按照清朝选官规定，中级官员任命前，皇帝要亲自接见，通过交谈观察官员仪表、言谈及品德，朱批决定升迁或降革。这是从顺治皇帝以来延续的惯例，皇帝大致每两天就要做一次。

另外，九月初四这天，最后一个绿框里的内容是什么？按照当时规定，每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皇帝都要去太庙祭祀祖先。十月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内页



初一要进行冬季祭祀，而祭祀前的九月份就要开始安排。九月初四这天，有关部门给皇帝上题本提示要准备祭祀，皇帝做了批示，安排了参与祭祀的大臣，他自己则要在九月底回到紫禁城做祭祀前的准备。这是每年都要做的事，每个季度都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举的只是两天的例子。这两天有代表性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代表性，要说的话就是寻常日子。如果把目光放长远些，看看整个九月道光皇帝的所作所为，内容会很多，我们来做个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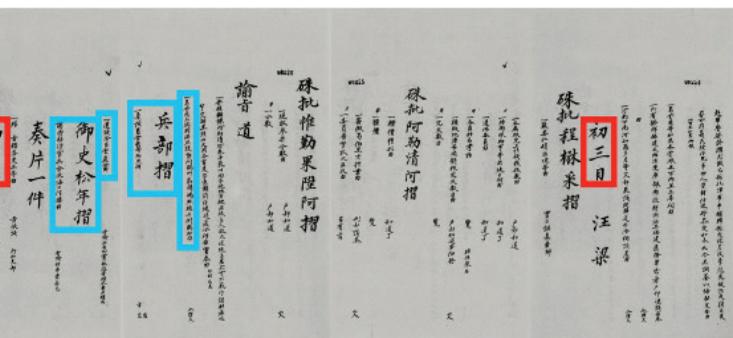
看看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的九月，道光皇帝都做了什么。第一件大事是批阅奏折，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每天大概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批阅。清朝皇帝是历史上最勤政的，不像明朝有些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清朝皇帝非常认真努力，每天要批阅很多奏折，《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里的大量内容，就是他们批阅奏折的目录，这是他的第一项工作，当然这些奏折中有一部分与鸦片战争战事

相关。

除了批阅奏折，第二项就是刚才提到的引见中下级官员。九月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秋审勾决死刑犯，这是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的体现。每年九月，按惯例刑部会把死刑犯的卷宗送给皇帝，由皇帝最后决定犯人该杀还是该留。不过道光二十一年没有进行秋决，这一年为何停止秋决？不是因为战事，而是因为这一年是他自己六十大寿。六十大寿是重要庆典，杀人毕竟不吉利，所以皇帝下令这一年停止勾决，当年的犯人等到第二年九月再处理。除了这些，他还要去西苑操场阅兵。西苑操场离清华很近，现在是西苑中医医院和其他一些机构，当时是驻扎在颐和园、圆明园周围的清军重要操场。皇帝会定期去那里检阅八旗军队，维持清朝的骑射传统，这也是隔几天就要进行的活动。

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准备冬天太庙祭祀祖先，最后一项是给皇太后请安。这些都是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他要做的事，而这一年东南沿海的鸦片战事正进行得很激烈。我们再将目光前移，看看鸦片战争之前的九月，他又在做什么？我随便找了一年，是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这一年是闰年，有一个闰九月，我们来看看闰九月他的工作情况。

我梳理了《起居注》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发现道光帝1832年做的工作类型和1841年一致，只是1832年批阅的奏折里没有鸦片战争相关内容，多是黄河水患、赈灾等事务。这些事务在1841年也



道光二十一年		道光二十二年	
九月的工作	1841	闰九月的工作	1832
批阅奏折		批阅奏折	
引见拟任用的中下级官员		引见拟任用的中下级官员	
秋审勾决死刑犯	道光六十大寿而停勾	秋审勾决死刑犯	
外出阅兵		外出阅兵	
准备太庙祭祀祖先		准备太庙祭祀祖先	
请安皇太后		请安皇太后	

道光帝的工作内容



常事可书，鸦片战争不是打开 1840-1842 年这段历史的唯一钥匙

存在。对照这两年的情况不难发现，道光帝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而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按当时说法叫“夷务”，不过是他批阅奏折内容的一部分，比例也不均匀，带有随机性。

“夷务”又是如何变成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这个词并非源自中国，实际是英国人发明的。虎门销烟后，英国人讨论是否要惩罚清朝、与清朝开战，当时英国议会和报纸上有大量相关讨论。到 1840 年，有一份报纸的报道中首次使用“鸦片战争”一词，后来这个名称就被用来指代这场战争。20 世纪初，这个说法传入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之后我们在历史叙述中也沿用了这个词。20 世纪以后，鸦片战争又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被认为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逐渐成为标志性历史事件。

有了这样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后，1840 年到 1842 年的历史仿佛被鸦片战争“包裹”，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丰富生活内容都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春秋·公羊传》开始，就有“常事不书”的说法，这种体例后来成了史学的金科玉律，延续了几千年。在它的影响下，史籍记录的多是异常、反常、不寻常的事，而那些平常的事、庸常的日子都被遗忘，无法进入历史记述。

就像 1840 年到 1842 年这三年，其实有黄河水

患、赈灾、经济问题、案件处理、皇帝祭祀祖先、向母亲问安等无数内容，这些都可以进入历史，只要我们有合适的问题，它们就能成为历史叙事的对象。1840 年到 1842 年的历史，不只有“鸦片战争”这样一种解法。正因为我们看到了道光皇帝的日常，才知道历史原本有这么丰富的内容，除了道光，当时还有没被卷入战事的众多官员、百姓，他们的生活、工作同样被遗忘。显然，若意识到“常事不书”的局限，便会发现“常事可书”，也应该“书”，这样可以对所谓“大事”有更恰当的理解。这种围绕大事展开的历史叙述，构成我们发现历史隐藏款的又一重障碍，需要突破它。只有挑战这种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定见，才能获得新见。

汉晋简牍里的无名小吏，同样值得书写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人物的“常事”，除了大人物，还有更多历史的隐藏款等着我们发现。

这些隐藏款来自哪里？来自历史观念的变化。我们逐渐意识到，历史不只是大人物创造的，小人物、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创造历史。正是这种历史观的转变，让我们能发现更多历史的隐藏款。

说到普通人的历史，到哪儿找他们的材料？研究晚近历史时，材料很多，容易发现普通人的身影。但对我研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来说，找普通人

的材料需要借助 20 世纪以来的史料大发现。20 世纪有“四大发现”的说法，这源于 1925 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暑期学校的演讲，他提到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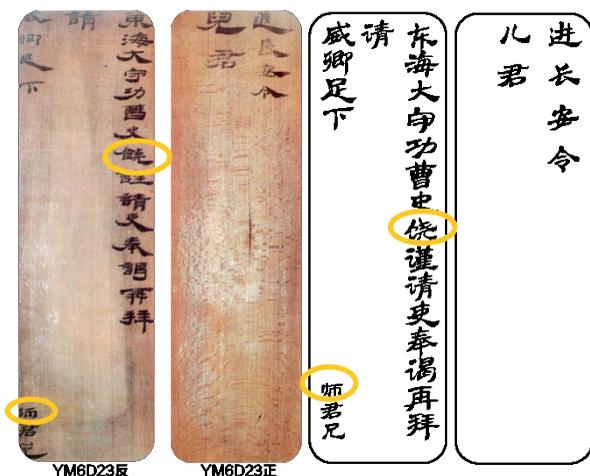
我今天要讲的是汉晋简牍，它从 1901 年开始发现，至今仍在持续，是四大发现中唯一的“常青树”。从数量上看，目前已发现 30 万枚简牍，未来可能还会增加，不久前浙江绍兴就出土了一些，以后其他地方或许还有新发现。

现在全国出土简牍的地点覆盖了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最南端在广东广州，西南地区云南有大量发现，北边在北京大葆台汉墓和通州副中心汉代潞城遗址的水井里均有出土，最东端是山东青岛黄岛的汉墓，最西端则在新疆发现了很多批汉晋简牍。

从时间上看，简牍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5 世纪），最晚到公元后 4 世纪的西晋与十六国时期，唐代在新疆也有出土，前后跨越近千年。从内容上看，简牍里既有《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典籍，也有秦汉时期的大量律令，数量更多的是行政文书。墓葬中还有不少作为随葬品的简牍，这些简牍里活跃着很多历史小人物，我们通过阅读简牍打捞他们的痕迹，发现他们生活的碎片。这些都是历史的隐藏款，能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下面给大家讲两位汉代的小人物，他们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当时的小吏。第一位叫师饶，我们通过墓葬出土的“名谒”知道他。这是位于江苏东海县尹湾村的一座汉墓，里面埋藏了很多木简和竹简，其中就有这样一枚名谒，相当于 2000 年前的名片。名片正面写着“进长安令”，是要送给长安县令儿君的；背面记录了送名谒者自己的职务和名字，左下角是他的姓氏和字。

从名谒背面我们得知，他姓师，名饶，字君兄，当时担任东海太守的功曹吏。东海郡位于今天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郡治在今天山东郯城县，师饶的家



尹湾村汉墓出土的一枚师饶“名谒”

在今天江苏东海县，离郯城县不远。功曹吏主要负责管理人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人事厅厅长或人事局局长。按现在级别算，大概是省级人事厅厅长，但他当时的实际级别可能只到人事科科长，不过是郡一级官员，而且是东海太守的亲信。

墓葬里除了名谒，还有不少文书，其中一份很有意思的叫《元延二年日记》。这份日记写在竹简上，大概有六七十枚，本身是元延二年的日历，师饶在日历空白处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行踪，包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住在哪里。虽然很多内容没写具体做什么，但我们能知道他这一年出差共 80 天，住的地方多是传舍和亭，住传舍的天数最多。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会心一笑，不光现在的职场人经常出差，2000 年前的小吏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从很多类似资料里都能发现，当时的小吏经常要出差，有时不仅到附近，还要去遥远的都城。比如刘邦起兵前就是个秦朝的小吏，就曾从老家沛县去过秦都咸阳，这是秦汉时期郡县小吏的生活常态。

师饶的日记多数只记录了出差日期和住宿地点，只有 9 月 26 日这一天写了具体事：“旦，逐贼，宿襄贲传舍。”这天他奉命去郯城县东北方向的襄贲县一带抓捕盗贼。当时，抓捕盗贼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如果盗贼出现三次以上没被抓

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长史、刺史从事史，这些是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的消费者。而鸡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提到了鸡的价钱，“一双鸡 80 钱”，也就是一只鸡 40 钱。

40 钱一只的鸡贵不贵？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同样在元康四年，全国大丰收，谷价很便宜，一斛谷物只值 5 钱。40 钱一只鸡，相当于 8 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 60 斤，8 斛就是 480 斤粮食。这样看，鸡确实非常贵。所以只有中央来的官员、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享用三升米或三升粟，只是碳水，没有什么副食。

除了这些，从《鸡出入簿》里还能发现什么？西汉时期全国是不是只有悬泉置这一个类似机构？现在只发现了这一个，实际并非如此。从西安到敦煌有 1693 公里：步行大概要 394 小时，按每天走 10 小时算，需要 40 天；骑车要 159 小时，差不多 16 天。沿途每天都要住宿、吃饭，现在有很多宾馆、饭店提供服务，但 2000 年前的汉代没有私营企业，只有官方设置的传舍这类机构提供住宿饮食。今天虽只看到悬泉置，但当时西汉全国交通线上有很多这样的设施，构成了一张交通网络。

我曾经做过统计，当时全国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 2057 个，每个都要承担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重复着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度过自己的人生。这些机构的运转成本很高，单说西汉末年，全国每年要消费约 15.2 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 240 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 2.9%，也相当于运到

长安的漕粮的 60%，这个数字非常庞大。

这样的机构不只是汉代有，后世各朝各代都有：唐代叫馆驿，宋代叫驿馆或递铺，元代叫站赤，明清叫驿站，今天就是政府的招待所。有学者推算，唐代和清代这类机构的年花费，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 10%。看似细微的开支，汇聚起来却很庞大，正是这些机构支撑着从汉到清的大帝国延续数百年，埋首其中千千万万普通小吏的身影，却被我们遗忘了。



睡虎地秦简主人喜

我们看《汉书·宣帝纪》里的元康四年，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人。刚才讲了时和师饶的故事，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人：湖北云梦睡虎地西汉简里，有一批工作日志，主人叫越人，墓里出土了他 14 年的日记，记录了这些年他的行踪，他生活在西汉前期文帝时期；睡虎地还出土过更有名的秦简，主人叫喜，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根据他墓里的头骨复原了形象，让我们看到了 2000 年前这位秦代县吏的样子。

通过师饶、时、越人、喜这四个小人物，我们



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质日

能看到常人的日常生活。之前说过，大人物的常事可以书写，大人物之外，常人的常事也可以书写，而且值得书写，这些都是历史的隐藏款，藏在冰山之下。没有历史观念的转变，没有新史料提供的可能，我们没办法看到历史深处的回响。好在今天我们很幸运，有条件看到这些，听到这些被遗忘已久的声音。

中国农业社会，历经千年方形成

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历史的隐藏款呢？刚才提到的汉景帝餐桌、道光帝办公桌、师铄日记、时的报告，都是大人物或小人物的生活碎片。若看向宏大历史，其背后也有更不易察觉的隐藏款，这种隐藏款关乎历史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可能性？清华历史系的老前辈、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农耕社会为例。如今我们正走出农耕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仅10%，2024年达67%，70多年间逐步进入城市化、工业化阶段，但此前几千年中国均为农耕社会。

中国何时进入农耕社会？最早栽培稻距今约一万年，粟栽培距今约8000年。按常规认知，或许认为那时已进入农耕社会，中国农耕传统悠久。这有一定道理，不同时期稻田、麦田遗址均有发现，比如汉代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当时这样的发达农耕区是否普遍？大家很容易会将某个局部发现的现象过渡推衍到全部，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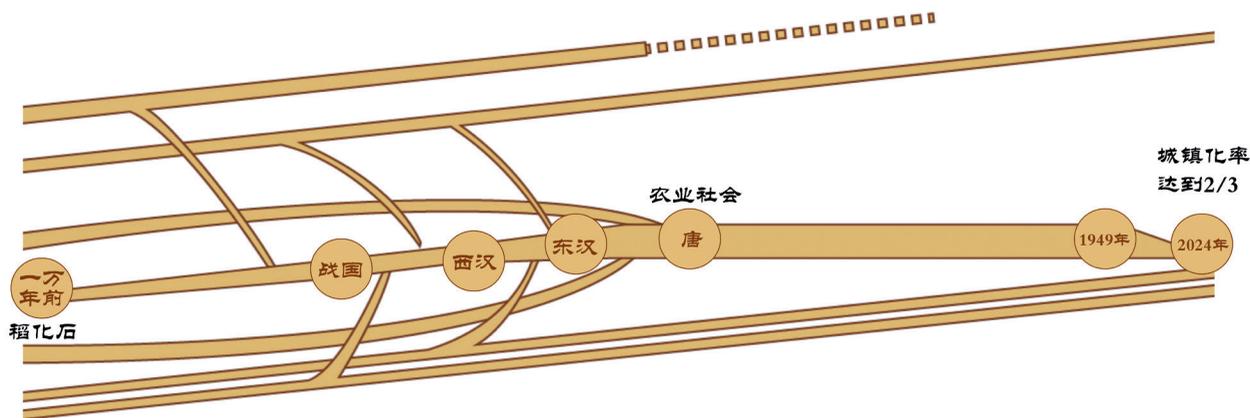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秦始皇统一前后颁布）提到：“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佩戴刀剑、成群结队出入活动，这些都不是好习俗，一定要禁止。“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百姓，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与如今人们偏爱买房不同。

再看汉代，虽发现了农田遗址，但《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很多地区却是农耕不发达。班固还描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这两地靠近游牧区，受游牧文化影响）；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有点出乎大家的想象。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西汉时即便是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落后的江南。

农耕社会如何形成？离不开众人努力，地方官作用关键。比如渤海郡（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西汉中期当地人并不重耕种，依赖渔盐、偏好经商。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树、种菜、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史载当地风俗很快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否真的很快实现，仍可探讨。

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凤台县）、邵陵县（今河南郟城县，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人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的风气持续久矣。郑浑任内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

龚遂、郑浑只是众多地方官的代表，正是无数人持续努力，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描述各地风土，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穡”“重农桑”等，用词略有差异，核心意思相同，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



中国农耕社会发展史

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可见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 1000 年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才真正进入农耕状态。

从以上示意图可见，一万年来农耕发展经多阶段缓慢推进，唐代实现普及，过程中不乏波折。完整历史图景是：不同时期多种生计方式并存，靠国家力量、皇帝努力（尤其地方官督促），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百姓被迫接受改造，中国主体地区最终进入农耕社会，部分地区仍保留渔猎、采集、经商传统，延续至今。1949 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开启新变革。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形成并非单线、必然，充满可能性。若齐国而非秦国统一全国，若历朝无“劝农”政策，地方官不督促，或难有此局面。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于道光帝、鸦片战争中。大家或许觉得鸦片战争清朝必败，但清朝是否有胜利可能？可参考同期英阿战争：1838-1842 年英国打鸦片战争时，还在阿富汗作战。英国已占印度，从印度出兵阿富汗（无需远途劳师），阿富汗小国、经济落后、实力远逊清朝，但英国却输了；1878-1880 年、1919 年第二次、第三次英阿战争，英国均败，最终承认阿富汗独立。对比可知，鸦片战争中清朝并非无胜利可能。

从历史可能性中发现人生的可能性

这种“历史可能性”值得重视，其背后关乎认识的可能性。“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若认识到历史可能性，就能在过去中发现潜在可能。

且历史与今昔紧密相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日努力创造，明日便成过往；个人“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大历史”。从认识历史可能性出发，能发现人生可能性——努力即可实现，而人生可能性就藏在日常中。

这里的“日常”，重点是“常”，指那些反反复复出现的活动，包括师饶、时、道光帝等古人的日常，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朝九晚五。这种日常是低沉却持久、生生不息的力量，蕴含无数可能，也是人人都拥有的力量。只要意识到、唤醒并善加利用，就能创造美好未来。

汉景帝与老鼠的故事，提醒我们认识自身经验与知识的有限；道光帝的日常，显示大事件并不是历史唯一的答案；师饶、时的例子，证明常人常事也值得纳入历史叙述；农耕社会形成的曲折与漫长，让我们看到历史可能性。最终，我们在历史可能性与日常中，发现自己人生的可能。

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解放的力量，我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